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22.05.014

内涵式发展转型驱动下的新建 地方高校文化建设研究

赵振杰^a, 韩晶^b

(常州工学院 a.师范学院; b.后勤处, 江苏 常州 213022)

摘要:内涵式发展是高校外延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实现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内在驱动力。高校文化建设和内涵式发展转型要求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当前,我国新建地方高校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着短视、功利和掣肘三个明显的缺陷。因此,基于内涵式发展转型驱动的新建地方高校文化建设必须注重地域特色文化、校园传播文化和大学管理文化,从提高认识、完善制度和落实措施三个方面进行加强。

关键词:内涵式发展;新建;地方高校;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2)05-0084-07

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明确战略目标。但如何使内涵式发展的抽象理念落地为具体的实践行动,目前应该成为各种新建地方高校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文化建设也许是其中值得探索的重要领域和研究课题。

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到了阶段之后,都必然要重视规模与质量是否一致、结构与效益是否协调的发展模式转型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新建地方高校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大多已基本完成以规模和数量为重点的外延式发展的基础积累阶段,逐步开始思考和规划“质量和效益至上”的内涵式发展战略性问题。这种转型不仅是新建地方高校主动迎接未来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必然要求,更是它们回应当前社会对各种专业人才质量需求新变化的必然选择。而且,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客观上也在促使大量的新建地方高校必须基于内涵式发展的驱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其中的一项重要改革领域就是学校的文化建设。因为文化对

高校而言既是凝聚人心的强大持久力量,更是评判一所高校是否真正具有特殊气质和精神韵味的核心体现。但这类高校的很多决策者在理解文化建设如何牵动学校内涵式发展方面存在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以及落实不力等突出问题,导致“新建”“地方”学校在文化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无定向、缺章法、少实效,反过来也就更难支撑内涵式发展的战略转型需求。

1 内涵式发展与高校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高等院校改革提出的战略性驱动要求,十九大报告更是基于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背景,提出了“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性发展目标。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基本满足了众多适龄青年接受必要高等教育的自我发展需求。但问题是,“有学上”和“上好学”是两个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的阶段性心理需要。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

收稿日期:2021-12-07

基金项目:2020年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B-a/2020/01/43)

作者简介:赵振杰(1970—),男,河南洛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增加只是满足了有需求的适龄青年“有学上”的初级需要,而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才能满足他们“上好学”的高级需要,这也正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应然趋势。

当前,面对有限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不同高校为了保持必要的发展优势和一定区域内的整体影响力,除了要在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上下功夫,也要重视并加强具有隐性竞争功能和持久支撑力量的文化建设。事实上,在国内外众多机构实施的大学评价和排名中,对一所高校是否具有内涵式发展特征的评价可能来自多元化的评价指标,如人才培养质量(就业质量)、科学研究质量、社会服务质量、学科发展声誉等。但不可否认,最终决定这些指标核心品质的内在因素在于文化建设质量的优劣,即渗透在一所高校可视化的各种物质载体(大楼、场地、设备、标识等)和精神载体(师生状态、校园氛围、制度环境等)上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义、教育理念、追求境界等非可视化的文化建设指标,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核心要素才是驱动一所高校真正实施内涵式发展的强大内在推动力。

1.1 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现实意义

1.1.1 内涵式发展是高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转型跃升的内在要求

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都必然要经过外延扩大和内涵提升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外延扩大是为了解决教育资源短缺、发展不均衡和体现基本教育权利公平实现的问题,其手段是增加高校数量和扩大学校规模。内涵提升则旨在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紧张和整体教育质量不足的问题,其途径是强化办学效益和文化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没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初级积累,整体内涵提升的发展基础就很脆弱。但如果仅有内涵提升的热情而缺乏必要的外延扩大,其整体发展的质量最终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当然,任何一所高校在完成了物质资源增量的原始积累之后,也必然需要对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功能和效益适时提出新的期待和新的要求。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高校生源扩招和高校数量扩容,即跃进式的外延发展运动。据教育部年度统计信息显示:1998年底,全国共有普通本科高校(不含民办高校)591所,当年招生规模76万多人,而10年之

后的2009年,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增加到1090所,当年招生规模扩增至326万多人,20年之后的2019年,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增加到1265所,当年招生总规模达到362万多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公办新建地方本科高校675所,占全部普通本科院校总数的53.7%。这些由多校合并、专科升格或独立新建而来的本科办学历史较短的高校,经过20多年的适应磨合之后,如今已基本完成办学基础积累和资源规模的储备。也就是说,这类高校校园面积的扩大、师生规模的扩大、学科专业的增加和仪器设备的添置等外延发展的任务告一段落,总体具备了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型的承载条件。在此境况下,它们自然也就面临着如何向内涵式发展模式顺利转型的主观诉求,即发展阶段的跃升,希望通过质量的不断提升逐渐回归高等教育的本体功能。

1.1.2 内涵式发展是社会对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人才质量提高的外在要求

纵观人类近现代历史,每一次重大科学技术变革都会对社会发展和教育革新带来新的挑战,使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各种专门人才很快适应和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由于社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必然需要高校提供各类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来进行支撑和保障,从而达到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

我国高等教育精英化发展阶段,高校各类专业人才的“少而精”供给模式很好地适应了当时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以及专业技术工作岗位相对短缺的现实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当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高等教育也逐步完成了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阶段的转变,其表现就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开始适度放缓,并开始由关注增量转向关注质量。如今,高校贡献给社会的人才储备不能仅仅是数量上的充分满足,且必须是基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所需要的质量上的持续保证。试想,“有量而无质”的人才供应模式对社会的创新发展根本无法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因此,对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而言,内涵式发展模式尤其应该成为众多新建地方高校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它们真正融入地方和区域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十几年以前新建地方高校盲目追求扩招、扩建、扩并的那种“以量谋

大”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目前已经到了不得不顺势转型的关键时刻。今后一段时期，“以质图强”的精细化发展模式必须成为这类“新”本科高校牢牢把握的战略发展方向。

1.1.3 内涵式发展是构建现代高校治理体系的衡量标准和目标追求

现代高校治理应当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和高校组织的本质属性,紧密围绕“提高治理、强化特色”这一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内涵式发展的理念和模式更加符合高校作为特殊社会组织的精神和职能,可以不断增强高校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现代高校治理体系的评判标准和目标追求,从内涵式发展的结果来看,就是要保证高校运转系统在外部的经济、政治因素、内部教师和学生因素等方面,都能通过质量保障体系使其始终处在一种满意的状态。

构建现代高校治理体系的衡量标准是通过“管办评分离”的机制,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大学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从而重塑三者之间的新型法理关系。要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就涉及高校如何准确定位和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如何充分利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制度优势,如何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学董事会制度,以及如何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找到最佳的利益平衡点。所有这些和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评判有关的目标追求,最终都必须落实到一个理念上,那就是必须实现高校的内涵式发展。

1.2 高校文化建设与内涵式发展之间的关系

高校的文化建设和内涵式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和互为包含的依存关系。文化建设是载体,内涵式发展是理念。一方面,文化建设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应然要求。缺乏文化内涵的所谓“内涵式发展”在根本上就是一种具有文化涂装的虚假内涵式发展,或者说是丢掉了灵魂和精神支柱的危险内涵式发展。另一方面,内涵式发展理念的正确指引可以加速高校的文化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防止热热闹闹的文化建设迷失于高等教育的存在本质,为文化建设的战略规划设定原则和边界。

1.2.1 文化建设有助于激发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在需要

文化是一所高校的灵魂所在,是大学软实力

的重要内容,是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方面,当然也是内涵式发展成果的重要载体和呈现方式之一。只有当内涵式发展模式成为高校各级决策者的一种主观认识和客观需要的时候,质量的提升就成为其最核心的评价和奖惩指标,其中的文化建设自然就成为凝聚人心和激励干劲的内隐指标。

实际上,内涵式发展是相对于外延式发展的一种发展结构模式,是借助于特定文化中所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以事物的内部核心要素为发展内驱力来配置资源和激发活力,把结构优化、质量提高、运行顺畅和健康持续等作为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在量变引发质变的过程中实现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并以此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实力。在现实中,一般认为,高校的外延式发展主要是基于扩大规模的目的,以增加学校数量、扩大招生人数、扩张校舍面积、增添设施设备等来显示发展成就,给人造成一种宏大而震撼的视听效果。高校的内涵式发展则主要是基于提高质量的目的,通过校风、校训、校规、名师、环境、特色等隐性力量的作用来彰显发展成就,从而给人留下一种激动而美好的持久回味。但是,当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的两大需求难以有效协调,或者产生对立矛盾的时候,对于以培养专业人才和从事科学研究为主要使命的高校来说,内涵式发展就意味着要暂停扩大规模的需求,高举精神文化和质量文化的需求,转变办学理念,提升教学和科研质量,注重学科特色和社会服务能力,从整体上优化高校形象和声誉,使高校的利益相关者都乐意为建设成效贡献更多的资源。

1.2.2 高校内涵式发展有利于推动文化建设的深化

内涵式发展是高校发展思维方式的战略性转移,需要用绣花的慢功夫来雕琢和打磨高校的整体社会形象。从长远来看,“数量必须服从质量,硬件必须服从软件,形态必须服从功能,从布局调整转向功能提升,从建大楼转向出大师”^[1]。一所高校从外延式发展转变到内涵式发展需要把文化建设贯穿到学校改革全过程,同时,内涵式发展也需要成为高校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毕竟,特定场域和特定载体的文化对任何一所高校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独一无二、难以复制的,比如管理文化、环境文化、课程文化、教学文化等。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表明,任何高校在发展的过程中,都需要一种经过凝练和认同的文化精神价值观的引导,使之逐渐成为高校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圭臬和宝贵的历史遗产。这种文化建设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坚定而持久的内涵式发展理念的烘托。在这一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下,高校领导的战略决策和各级部门的落实执行就有了无形的精神发动力和道德自觉性。全校每个教职员和大学生也在大学文化长期熏染下,逐渐形成带有学校特定文化烙印的言行举止方式。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等世界著名大学的魅力所在,根本上不是依靠它们的校园面积、师生人数、项目数量和资金多少,而是几百年坚守以教育质量为本的内涵式发展积淀形成的特色文化。因此,高校内涵式发展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和最好应对,是增强学校精神凝聚力的强大旗帜,是彰显学校竞争软实力的有力抓手,是提升办学质量和扩大影响力的稳固基础。

2 当前新建地方高校文化建设的缺陷

高校文化建设虽然是一个理论界和实践界常谈常新的老话题,文化建设方面的改革创新也都在持续探索中推进。但是,对于办学历史悠久和文化资源丰富的老牌知名大学来说,文化建设的任务可能重在传承和创新。而对于办学历史和文化资产本身就处于竞争弱势的新建地方高校来说,目前在文化建设的实践操作中仍然明显存在着一些缺陷和短板,或多或少影响着学校内涵式发展进程的推动,文化建设的实效当然也不容乐观。

2.1 认识肤浅,流于表面

一些新建的地方本科高校由于发展历史阶段的限制,再加上国家高等教育评价方式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客观上给这些高校的领导者带来了盲目追赶985、211等重点高校办学评价指标的压力,更有甚者会根据国内外大学排名机构的指标体系进行一一“对标对表”,开展运动式的看齐追赶,从而导致文化建设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偏好和表面繁荣的虚假现象,一些文化建设的所谓“成果”明显缺乏文化内涵和凝心实效。原因是,一方面,高校领导者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财物资源没有给予足够的倾斜,进而限制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深度、广度和高度。特别是在各种所谓国际化信息

浪潮的迷惑下,很多高校热衷于建设好看的时尚文化和快餐文化,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影响的提炼和把握,对碎片化的网络文化渗透并减弱高校文化建设成果的现象也预估不足、研究不透,当然应对的方法也不多,从而使高校文化建设实际上处于一种“似有实无”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基于思考的不成熟和研究的不透彻,在具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中,高校领导者往往把校园文化建设成果的呈现方式狭隘地理解为师生的校园文体活动、对外宣传活动、学术交流活动和校园环境的美化活动等,却恰恰忽视了最能体现文化内涵和文化品质的人的精神因素建设,造成师生教育情怀弱化、利己思想膨胀甚至底线原则丧失,包括师生的政治追求、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等各个方面,最终整个学校从本质上开始慢慢偏离了文化建设内涵的正确轨道。

2.2 急于见效,注重功利

总体来看,目前新建地方高校的文化建设表现为缺乏系统性和长远眼光,内涵建设存在空壳化和文化建设功利化现象。最高决策者在任期内急于呈现执政业绩,对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慢效性明显判断不足,主观上削弱了文化建设在内涵式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积极促进作用。其一,在文化建设的规划上过分侧重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而缺乏整体设计,文化建设的战略框架结构不完整,在凸显文化建设特色和亮点时,与之相配套的文化要素无法呈现,导致内涵式发展转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憾。其二,高校文化建设需要一届一届的领导者接续奋斗才能成型传承。但由于我国高校领导的任命和使用存在较为相对稳固的任期,调动升迁变化较快,导致前任领导执政期内实施的文化建设规划在“新官”任内存在一定的中断或改弦易张的风险,使高校内涵式发展转型所需要的整体文化建设缺乏稳固的制度保障。长此以往,最能体现文化精髓的学校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形成和维系难度就较大。其三,新建地方高校在文化建设中没有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的有机整合,存在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的盲目自大。非专业的决策者善于从一己主观感受出发对所管辖高校文化建设进行定位,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和建言热情,文化建设上自然就难以产生积极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内化,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自然难以形成。

2.3 机制掣肘,资源不足

一所高校的文化建设离不开强力顺畅的内部管理运行机制来持续推动,并进行必要的专项人财物投入来保障,以营造浓厚强大的文化发展场域。否则就难以调动校内外各种有利资源为文化建设战略实施提供支撑。总体来看,目前高校文化建设推进机制上存在着顶层设计长期议而不决,职能部门权责交叉、责任推诿,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性与联动性不足……这些问题导致文化建设项目落实难、推进慢、质量差。新建地方高校已基本完成文化建设所需的各种硬件资源准备,如漂亮的活动场地、先进的宣传设备、优美的环境等均不逊色于985、211等一流大学和老牌高校,但真正欠缺的是附载于这些硬件资源上的文化内容。也就是说,新建地方高校文化建设的软件配套资源供给不足。这些高校在办学历史、办学成就、社会声誉、人文环境等基础条件方面原本就相对落后,加上各种办学机制的掣肘,以致在激烈的高校竞争中难以吸引更多高学历和高职称的优秀专业文化人才加盟,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所依托的办学质量就难以持续提高,其结果就是这些高校内涵式发展转型的阻力比其他高校要大得多。

3 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新建地方高校文化建设重点内容

“高等教育向内涵式发展转变,面临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机制的种种困难,不改革、不突破就没有出路,不触及深层次矛盾就难见成效。”^[2]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转型是一项综合改革的系统性工程,文化建设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支撑板块。当然,文化建设对某些高校来说,可能也是其中最核心和最困难的建设领域。内涵式发展强调的是“质量”的持续提高而不是“数量”的爆发增长,而质量持续提高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就是需要建设良好的高校文化环境,包括文化硬环境和文化软环境,并通过管理机制的创新实现两种文化环境作用的有机统一。在当前“985”“211”“双一流”等高校身份壁垒一时难以撼动的情况下,从自身可持续发展和校际竞争加剧的现实出发,新建地方高校的文化建设必须立足和服务于内涵式发展转型所需要的内容和路径。

3.1 浓厚的地域特色文化

地域文化和大学文化是两种具有必然联系的

不同亚文化。地域文化是一个区域内的人们在特定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时间积累和创造而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体。地方高校是隶属于地方、依托于地方和服务于地方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与地方共存共荣、相互促进的文化发展综合载体。高校文化建设的地方特色是绝大部分新建本科高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这类高校立足并根植于所在省市县的地域土壤中,必须充分发挥地域优势,深入挖掘、研究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在同类高校中形成文化建设竞争力,并将之有机融入校风、校训、纪念品、伴手礼、标语口号等显性载体中。因此,在新建地方高校的内涵式发展过程中,文化建设的任务之一就是传承和创新地域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上凸显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文化特征,如地方名人文化、地域建筑文化、地域语言文化、地域历史文化等,从而不断提高地方高校的地方文化意蕴和品味气质。

3.2 创新的校园传播文化

大学校园文化给人最直观的内容载体是可视、可听、可感、可触的物质文化,并通过这些物质文化传递和传播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人文素养、竞争赛道等内隐的精神文化。目前,新建地方高校普遍存在“三新”现象:校区新、校舍新、设施新。和历史文化较长的其他高校相比,这类高校的图书馆、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等履行教育功能的物质载体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薄弱。外形漂亮、设施先进的崭新建筑很难向受众传递厚重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也是新老高校在文化建设竞争上的先天差距。因此,新建地方高校在追求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在物质载体的文化传播能力上下足功夫,最大限度挖掘办学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先进的硬件设施来传播精神文化内容,从而用超前的创新思维打破文化竞争上的短板,使校园的一草一木、一馆一楼都能恰如其分地提高文化品牌吸引力。

3.3 严谨的大学管理文化

“大学管理文化”是高校在实施管理活动过程中,由管理者和管理对象共同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习惯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切活动^[3]。大部分新建地方高校都是从原有专科层次学校合并或升格而来。他们在结合、磨合、融合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本科办学经验不足、协调

运行机制不畅、管理文化混乱、行政化现象严重和师生素质相对低下等弊端,甚至有的高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形成严谨而高效的管理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运行机制,久而久之就很容易给外人留下一种声誉不好的管理文化印象。因此,这类高校的管理文化建设亟须厘清行政归属体制,重塑整体管理机制,畅通民主参与渠道,加强监督平台建设。

4 内涵式发展转型中新建地方高校文化建设的途径

4.1 党委决策层准确理解文化建设内涵

“高校党组织引领大学文化建设既是自身职责所在,也是把握文化建设前进方向,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作为一所高校的领导集体,书记和校长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最高党政决策者和指挥官,他们对文化以及文化建设的内涵认知和本质把握直接决定着高校文化建设的深度和高度。因此,高校的第一责任人首先准确完整地理解文化建设的深刻内涵至关重要。他们至少要认识到:文化可以体现为显性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隐性的心理文化、道德文化、精神文化。高校文化是在较长时期内积淀形成的精神价值财富,是一所高校良好办学理念和管理智慧的隐性成效体现,是在高校治理实践中自然凝聚形成的特殊文化共同体意识,并通过广大师生员工的外在行为方式、稳定心理倾向、内在精神气质和校园文化氛围得以体现。高校文化的科学内涵包括价值理念、认同情感、职业信念、审美情趣、工作作风、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其核心是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自觉,其具体内容渗透在高校的所有管理层级和专项活动之中,如教学文化、体育文化、艺术文化、后勤文化、政治文化等。深圳大学作为一所年轻的地方高校,其党委书记刘洪一曾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大学文化建设是提升大学内涵的重要路径。没有文化的事业没有希望,没有文化的高等教育便失去了创新、发展和传承文化的基本要义。《深圳大学文化创新发展纲要》就是以大学文化建设为统领,实施大学精神、立德树人、师德师风、学术文化等十大具体工程,其最终目标都是指向大学的内涵发展^[4]。总之,高校党委的主要决策者必须把文化建设看作是促进内涵式发展转型的系统性工程,

而决不是发展道路上的“美丽点缀”。

4.2 部门管理层全面设计相关制度

一个组织的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一个管理良好的高校一定要具有优秀的文化。高校物理空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场域,其文化建设要发挥特有的化学效能,必须通过各项规章制度来激励和约束每个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言行举止,进而使之转化为他们的道德自觉和精神灵魂。只有建立起完善的规章制度,才能为文化建设奠定稳固的管理基础。高校各个管理部门尤其是主要党政机关部门要全面设计和文化建设相关的规章制度,充分激励调动学校师生员工民主参与的积极性,全面梳理和评估现有各项制度是否有利于文化建设。缺乏的要及时补充完善,过时的要及时修订或废除,从而在全校上下、校园内外形成围绕文化建设为核心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工作制度、评价制度等。当前,新建地方高校需在内涵式发展模式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努力创设能够体现一所高校历史、性质、定位、特色的文化环境,以及这种特殊文化环境长期浸润下形成的带有鲜明高校符号的文化人。

4.3 学院执行层持续落实具体措施

显然,文化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见效的工程,是学校通识教育和养成教育综合发挥融合效应的结果,是知行并进的教育过程。高校的通识教育在文化建设中起着人文知识普及和人文精神积淀的作用,不同学科、不同门类的通识课程因涉及的“以文化人”领域不同,短期内难以呈现明显的效果。一所高校的通识教育内容、结构和运行措施如果出现因人而变、因人而断的情况,文化建设的任务之一——知识武装头脑的任务恐怕就难以实现。另外,养成教育对文化建设的个人主体根本上起着知行合一、践行塑型的实践教育意义,其显效更是非一日之功。因为,说到底,养成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养成习惯,这是“文化作为一种育人方式而表现出来的区别于课程教育的基本特征”^[5]。可以预见,带有某所高校文化建设成果的信息一定会通过广大师生的日常行为习惯而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并成为文化遗产和文化传播的载体而促进高校的内涵式发展进程。因此,对任何一所高校来说,文化建设中既已确定的良好制度和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明确规定变更的“红线”和“底线”,一张蓝

图绘到底,不能因书记或校长的任期更替而随意变化,更来不得半点短期功利思想。

总之,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今后,新建地方高校在深化全面改革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这一趋势,基于区域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总体布局和推进节奏,实事求是结合校情禀赋和外部资源,整体谋划,联动实施,在耐心的等待中看到内涵式发展目标和文化建设工程相互呼应、同步见效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 [1] 刘朝马,吴敬,徐木兴,等. 高校内涵式发展战略研究——以浙江理工大学为个案[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9(6):933-936.
- [2] 王文杰等. 推进大学文化建设实现内涵式发展[J]. 前线,2021(2):74-77.
- [3] 周爱珍. 大学管理文化应突破“经济人”假设误区[J]. 大庆社会科学,2018(4):143.
- [4] 刘洪一. 探索高校内涵式发展路径[N]. 光明日报,2017-11-16(02).
- [5] 冯刚. 文化的功能与文化素质教育[J]. 中国高等教育,2009(Z1):10-13.

Study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ly Built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riven by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ZHAO Zhenjie^a, HAN Jing^b

(a. Normal School; b. Logistic Department,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22, China)

Abstract: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demand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fter their denotative development has reached a certain stage.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dependence an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requirements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obvious defects, namely shortsightedness, utility, and constraints,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ly-built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ly-built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campus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university management culture, and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 from three ways, which are awareness-raising, system-improving and measures-implementing.

Keywords: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new constructio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ltural construct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